

1003/1

革命史資料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革命史資料》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八七·北京

责任编辑：郭丽卿

标题书写：周彤影

革命史资料

17

《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

*

(限国内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景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7年10月第一版·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82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1.60元

统一书号：11224·250

目 录

刘培植	奉周恩来命同王以哲刘多荃晤谈经过……(1)
方知达	内蒙古东部地区政权建设的回忆……(5)
柯 麟	李硕勋在广州、上海、香港等 地的战斗……(26)
杨 凡	青年时代的古柏同志……(30)
陈子谷	回忆林植夫……(38)
蔡寄尘	忆胞兄蔡以忱烈士……(45)
吴邦彦	关于云南和平解放运动的主要情况……(50)
王倬如	在北平办印刷厂做秘密工作的经过……(53)
林 青	地下通信斗争的回忆……(65)
王超北	怀念 西安情报处梅永和、胡家兆 烈士……(81)
喻 杰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日子里……(90)
高存信	张学思与东北干部队挺进敌后……(100)
莫文骅	长征中的红色上级干部队……(125)
韩 浚	从警卫团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136)
赵 杰	回忆解放沈阳片断……(148)
袁 光	抗美援朝片断回忆……(154)

赵兴让	中国红十字会一支医防队赴太行山 工作经过.....	(162)
冯宝庆	德州船民装运联合国救济物资经过.....	(172)
江泽民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	(176)

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的新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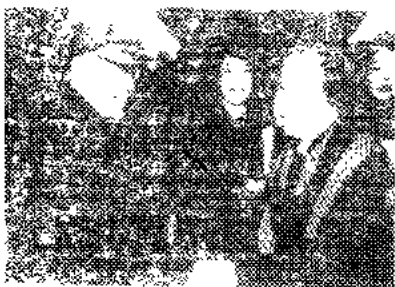
李 纯	史健同志忆往.....	(202)
张天珩	有关抢运《赵城金藏》的一些情况.....	(204)
李溪林	赴广胜寺抢运《赵城金藏》的回忆.....	(205)
曾 远	抢运经卷前后.....	(208)
宋洁涵	地委机关参加了背经.....	(210)
刘德裕	赵城县大队参加抢运藏经经过.....	(210)
陈 星	洪洞县大队配合抢运《赵城金藏》.....	(211)
李万里	《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	(213)

人 物 · 书 信

陈良义	干革命光明磊落死实荣幸 —— 陈良义遗书.....	(226)
朱庭华	陈良义烈士小传.....	(228)

奉周恩来命同王以哲刘多荃晤谈经过

刘 培 植



1983年元旦，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邓颖超主席亲切接见王以哲将军之子王育斌，并说：“王以哲将军为革命事业立了大功。”

大约是1936年2月间，我经陕甘省委（我是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去甘泉县城做争取东北军67军107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我通过关系获得成功。当时刘愿停止内战，同红军联合抗日。后来在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下，在该师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和党委。红军也从此和107师建立了友好关系。

那时我虽不知道王以哲将军的政治态度，但没有王以哲军长的默许和暗中支持，刘翰东师长是不会也不敢同红军联络和建立友好关系的。随后，我持红29军军长肖劲光同志的信，去郿县城内作67军所属的129师周福成师长的工作。由于此人顽固，未能成功，并扣押了我几天。后来明里放我走（不杀来往之人），暗中却派保安队在我回苏区的途中暗杀我，但未能成功，反被红军游击队打伤多人。

同年二三月间，我持周恩来副主席的信去洛川会见东北军的中将军长王以哲和中将师长刘多荃。路经甘泉县城107师师部时，会见了刘翰东师长，他见我衣着不称（当时我身穿不规格军衣，



刘培植抗战时期留影

系着武装带，提大公事包，佩派克笔，不象东北军军官的样子），让我改换了他们的旧军衣，佩戴了他们师的臂章、胸章，并派大卡车秘密护送我到洛川城内。我初到东北军，不习惯他们那一套立正敬礼，当即引起副官长怀疑。副官长撕开我带的信一看，说：“你是共

匪代表”，当即向政训处主任告发，我被扣押多日。我在被押期间，向看管我的三个排长——丁毅、唐玉峰、葛宜芳等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他们的同情。他们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要求参加共产党，并提出保护我逃走等等。（后来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苏区，经周副主席批准，他们都由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成立了支部。）

在我被押期间，唐玉峰通风报信，并向刘多荃师长报告了红军代表被扣押之事。一天，刘多荃师长半夜到洛川飞机场（我被扣押的地方）见我，道歉说：“刘老弟，对不起，委屈你了。我代表俺们（凤城人口语）王军长（以哲）向你道歉，感谢周先生（周副主席）的抗日决心和关怀东北军的诚意，俺们愿同红军联合抗日。”接着，他代表王以哲军长同意我们提出的3个条件：1、停止向红军进攻，万一有命令进攻时枪口朝天放；2、互派代表秘密来往；3、协助红军从西安购买一批军用物资。谈判结束天还未亮，刘即派武文祥连长用军用卡车连夜送我到甘泉107师师部。刘翰东师长见我安全回来，很高兴地说：“我暗中打听你的消息，很着急。现在我可以向红军交差了。”

我这次在洛川没有见到王以哲军长，回到苏区即向省委和周副主席汇报完成任务的经过。周副主席很高兴，说：“又扣又放，这证明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正确，东北

军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张学良4月9日延安会谈时，告诉周副主席说，你们派到105师和67军的人，是我打电话给王、刘，让他们秘密放回去的。大约四五月间，省委通知我，周副主席指示我再去洛川。我这次见到了王以哲军长和刘多荃师长，说明周副主席感谢他们的抗日诚意，感谢他们在物质上帮助红军。同时进一步说明要抗日必须反蒋，不反蒋抗日不得胜利的道理。随后我提出帮助营救我们被押在洛川监狱中的郿洛县苏维埃主席赵江鸿同志，王军长当时面带难色，推让刘师长办。刘说军队不便干涉地方行政。这时我又提出给我派两个护兵，刘同意了。我带着两个护兵去探监，给赵江鸿同志助了威，我命令监狱长不许虐待赵先生。

同年六七月间我再次去洛川。王军长、刘师长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就是在红军西征后东北军将要离开陕北苏区西调，开拔到甘、宁一带集结，阻止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并要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周先生”。我赶回苏区，欧阳钦同志带我去保安，向周副主席汇报了这一重要情报后，中央和周副主席指示陕甘省委派我再去洛川，随67军和105师行动。并指示我到红一方面军听彭德怀同志指示，继续作东北军的工作，同东北军保持联络（以中央联络员名义）。我到洛川向王军长、刘师长说明来意。他们建议我不要随军行动，因为有人知道我是红军，行动反而不便，要我先去西安等他们部队到平凉驻防后，再电告我去。过了多日，我接到105师驻西安留守处电报说“已到平凉”，即到前线去见彭总。我把平凉67军和105师驻防分布情况，王、刘的政治态度以及东北军和红军在陕北的友好关系，一一向彭总作了汇报，并转达了周副主席关于争取东北军的指示。彭总亲切地问我谈话，给我腊灯和文件让我看，并安排我在他的房内住了一夜。同年九十月间，彭总和朱瑞同志指示我去平凉邀请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何柱国军长（骑兵军）同来前线会见，共同协商停战事宜。我到平凉把彭总的意见向王、刘面述后，王军长当时高兴

地说：“我有幸能见到彭司令，太好了。”我又陪王军长、刘师长同车到了固原县骑兵军军部，见到了何柱国军长，说明来意，何说他有事去西安不能去前线。我便同王、刘到了豫旺县境的三营子2旅旅部所在地唐村尧旅长处，这时王军长接西安总部急电返回，未能见到彭总。但他同意和红军打假仗，暗中友好。他让刘师长指挥步、骑各部队接应被红军包围的马鸿宾一个团。当时红军有意放出这个团，便于东北军向蒋介石交待。

以上是我奉周恩来命令同王以哲将军的几次接触。

我和王以哲同志接触不多，时间不长，对他了解很少，但他的儒将风度实在感人。他有理想、有远见、有胆略、有抱负，国家民族观念极强，他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压力下，联合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志从不动摇。他先是支持东北军107师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同意105师和红军订立口头停战协定，继而同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签订了正式停战协定。1936年4月9日，他又随张学良将军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在促成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重大问题上，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革命立了大功。

可惜他因拥护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惨遭杀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重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和我们党的损失。

（1984年10月21日）

内蒙古东部地区政权建设的回忆

方 知 达



1946年冬，方知达留

影于齐齐哈尔市

1946年初至1949年秋，我曾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工作。现将这一段个人经历，就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写成材料，聊供关心内蒙古革命史的同志参考。

—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满洲国”彻底垮台。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复杂形势，针对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的狂妄野心，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伟大战略方针。10月初，

新四军第三师奉党中央命令，从江苏省北部抗日根据地出发，由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率领4个旅又4个独立团（主力）以及其他战斗单位和非武装人员共约四五万人，从陆路赶往东北。师部于12月初到达阜新。1946年1月上旬，在攻克“国民党”（实为敌伪残余和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土匪）占据的内蒙古东部通辽县城后，师部进驻通辽。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师党委决定成立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蒙族联谊部”。方知达任书记，成员有洪学智（副师长兼参谋长）、喻屏（通鲁工委书记）、宋乃德

(师财委副主任兼通辽县长)等同志。工作人员有蒋弼仁、沈长江等。其任务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办训练班，培养蒙族青年干部，做蒙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等。参加训练班的蒙族学员有额尔登仓、周玉芝(女)、韩如蛟、德力格尔扎布、特木尔巴干、阿拉坦巴干、李晓春、包淑珍(女)等20来人。

1946年2月底，师部奉命东进到郑家屯(现名双辽)。这时，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已在郑家屯成立，李富春任分局书记，吕正操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李富春兼政委，张平化任分局民运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黄克诚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后兼西满军区司令员。我随师部到郑家屯后，李富春、黄克诚同志决定我担任蒙古工作组组长，对外称“蒙族联谊部”，我任部长，副部长为赵大同，工作人员仍是蒋弼仁、沈长江等。

郑家屯离哲里木盟政府所在地巴彥塔拉不远，骑马一小时左右可到。这时我的任务是向哲盟盟长乌力图等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们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意我们派干部到盟、旗帮助工作，并在巴彥塔拉开办蒙族青年军政干部学校，由乌力图任校长，李洪范、章泽任副校长。

不久，东蒙自治军司令阿思根来到郑家屯谒见西满分局领导人，李富春和黄克诚指示我同他会谈。会谈结果，他代表东蒙自治军，我代表西满军区，签订了如下协议：1. 东蒙自治军接受西满军区的领导和指挥，并欢迎我们派去各级政工干部，2. 西满军区保障供给东蒙自治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此项协议书由我起草，交阿思根过目同意，呈李富春批准。然后我用钢笔抄写一式两份，阿、我各执一份。会后阿思根去巴彥塔拉李青龙旗长家住，我随即前往，和阿思根促膝长谈，直至深夜。

同时期内，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的女儿博丕容、女婿金世琳到西满分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敬意，分局指示我设宴招待，向他们宣传我党民族政策和对时局的主张。

1946年春，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一面宣布关内“停战”，

一面积极派兵抢夺东北，占领锦州、沈阳，攻打四平。3月底4月初，西满分局派我去沈阳，代表西满参加“调停小组”的我方代表组，但因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猖狂向北进攻，我中途奉命折回。这时西满分局已从郑家屯、洮南搬到白城子。

二

我回到白城子西满分局后，李富春指示我去王爷庙。行前他向我分析了时局形势，传达了党中央的基本方针。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已经向东北大举进攻，我们必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并准备打仗。中央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西满背靠内蒙东部（以下简称东蒙），东蒙是我们的大后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这里是兄弟民族地区，不能采取在汉人区开展工作时的那套工作方法，要做好蒙族上层统战工作，使我们进去能够站得住脚，尔后再进行培养蒙族革命青年、发展党员等各项工作，并通过他们去发动群众，为改造东蒙政权和军队等创造有利条件。目前东蒙内部存在着革命力量，但他们缺乏革命经验，思想也不一致，我们要依靠、团结、帮助他们。接着，富春同志向我介绍了承德“四三”会议简况通报，并指示我此去的任务是配合我党东蒙工委，深入了解东蒙上层各种政治势力的动态，摸清改组东蒙自治政府为兴安省政府的可能性，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政权直接掌握在我党领导之下。

1946年4月中、下旬，我到了王爷庙。这时已有张策（东蒙工委书记）、胡昭衡、胡秉权等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成员和刘选、毕舒国、黄文飞、谷献瑞、胡殿士等同志在做各方面的工作。工委对外称为西满军区办事处，根据当时的政治条件，所发展的蒙族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中。

我在东蒙工委的帮助下，着重同博彦满都、玛尼巴达拉以及其他上层人士打交道。这时玛尼巴达拉刚从北平向国民党请愿回

来（详情下文介绍），此人阴险狡猾，两面三刀，常以“翁姑之间难为媳”（意指“东蒙处于国共两党之间不好办”）作口头禅，明里暗里阻挠、破坏我们的工作。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了解，我带着东蒙工委的意见回分局汇报，把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归纳为以下三点：

1. 东蒙古自治军和东蒙古自治政府。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蒙联军进入内蒙古地区后，日军被粉碎，伪政权被解散，我党我军的主力尚未赶到，东蒙的革命青年（包括青年军官）纷纷举行起义，成立了各种民族自治武装和革命组织，进行平叛剿匪，维持治安等保护人民利益的活动；并曾去突泉县救出被国民党囚禁的胡秉权，去白城子支援我夏尚志、朱继先的先头部队。1946年1月间，东盟革命势力联合上层分子在葛根庙召开东蒙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政府虽然选出博彦满都为主席，但实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势力手中。例如：在代表会议举行时，胡秉权（以后查明还有朱继先、黄文飞）以延安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并讲了话。我到王爷庙时，东蒙古自治军已有胡秉权、黄文飞、李一夫等同志担任各级职务。东蒙古自治政府设有内防部，主管部队和公安工作，由阿思根任部长，张策同志任内防部的政委。根据以上的事实，东蒙古自治军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性质是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当然，内部情况还比较复杂，需要我党去加强领导，进行改造和提高。

2. 东蒙革命青年和东蒙上层势力。东蒙革命青年是一支举足轻重的革命力量，它不仅是使东蒙出现了有利于我的大好局面的主要势力，而且是决定今后局势发展的主力。东蒙革命青年广泛分布于军队、政府、学校和群众团体之中，他们在军队中基本上掌握着领导权；在政府中担任着一些职务，牵制着上层势力；在群众团体中则极为活跃。东蒙革命青年团是我们的得力助手，主要负责人有特古斯朝克图、巴图巴根、纪锦涛、布特格其、德力格尔、哈斯等同志。青年团在军队、政府和工作队、军政干校中

都有自己的团员，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态度坚决。我党东盟工委由胡昭衡负责做青年团的工作，并担任东蒙军政干校的政委；由刘选同志负责做妇女协会的工作。至于东蒙上层，则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以玛尼巴达拉为代表的极少数人，属于右倾势力；以博彦满都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对我们不即不离，属于中间势力；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等同志属于左派势力，他们欢迎共产党领导，在革命青年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们在承德“四三”会议上同意解散“内蒙人民革命党”，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阿思根未去参加承德“四三”会议，他是向西满分局提出入党申请的）。他们是革命同志，但有弱点，政治上需要给以大力支持和帮助。总之，根据以上复杂情况，我们需对东蒙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3. 关于改组东蒙自治政府为兴安省政府的问题。经东盟工委同哈、阿、特等有关同志和青年团负责同志研究，认为改组问题不大，关键在于做好各方面代表的思想工作和对上层人士作适当的安排。玛尼巴达拉可能暗中捣乱，但形不成多大阻力。

富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指示我立即起草兴安省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纲要（包括省参议会），经张平化审阅修改，由西满分局批准，交我带回王爷庙，通过东盟工委向各方面做工作，征求意见，如无重大分歧，即着手召开东蒙代表会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已有区域自治政府，为何要对其进行改组，另成立省政府呢？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承认蒙古民族自治，这样做在当时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一种让步，但民族自治性质不变。行前，富春同志特别强调说：“这里是兄弟民族地区，只能多做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你们赤手空拳进去，靠什么？靠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紧紧依靠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分子，并寄希望于东蒙革命青年。”此外，富春同志对代表会议的召开，上层人士的安排，兴安省主要领导人，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的组成等，都做了具体的指示，使我对在该地区所应采取的具

体方针政策，更加明确。

我回王爷庙向东蒙工委传达了富春同志的指示以后，立即参加工委领导的为召开东蒙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兴安省政府而进行的筹备工作。这次同我一起去的有蒋弼仁，他以后在创建科右前旗巴拉格歹区政府时，遭匪徒暗算，光荣牺牲。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在猛烈向我进攻。四平、长春前线正在激战，我军处于防御地位。东蒙代表会议在这样形势下召开，玛尼巴达拉等个别反动分子扯起“保持中立，不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和“实行民族独立”的破旗，暗中捣乱，妄想把我们撵走，等待国民党来接收。我们则紧紧依靠进步力量（主要是革命青年），积极同左、中以至中间偏右的人士进行充分协商，揭露玛尼巴达拉等人的阴谋，使其陷于孤立。这就争取了多数，赢得了胜利。

1946年5月28日，兴安省政府宣告成立，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副主席张策，秘书长方知达；省参议会议长博彦满都；兴安省军区司令员阿思根，政委哈丰阿，副政委张策，政治部主任胡昭衡；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主任哈丰阿。同时，成立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策，成员有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方知达（哈、特、阿三同志已经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西满分局决定吸收他们参加兴安省工委）。根据省工委的分工，由我担负省政府的日常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则同班策拉其格保持联系，此人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真理报》记者身份驻在王爷庙，实际是搞情报。我曾向富春同志请示过怎样对待他。富春同志说：“对兄弟党、友好国家，不好请离开。但是可以对他说，要搞情报，去搞国民党的，我们给予方便，不要搞中国共产党的。他们需要什么情况，我们可以提供。”于是我通过哈丰阿传达了上述指示。以后，班策拉其格派人去长春转往北平，我们给开了“路条”（解放区通行证）。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蒙族青年、知识分子、开明人士在这一

时期复杂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虽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毒焰嚣张的情况下，能够跟着共产党走，特别是绝大多数蒙族进步青年，革命态度坚决，有的甚至在战斗岗位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例如优秀革命青年纪锦涛烈士）。这种革命精神和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兴安省辖兴安、哲里木、纳文慕仁、呼伦贝尔四个盟。因当时蒋介石大打内战，战火烧至东蒙南部，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哲里木盟的突泉县，高力板（科右中旗）暂归辽北省代管，但在该地的领导人如赵石（哲盟）、张维桢（突泉）、徐一行（高力板）等仍常来王爷庙汇报请示工作，胡子寿、宋振鼎、李菊（女）等也陆续调到兴安省。

当时，毗邻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西部的尚有郭前旗、郭后旗、杜尔伯特旗、依克明安旗，称为（兴安）省外四旗。这四个旗虽然分属吉、黑两省，但和兴安省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蒙族干部的培养和交流方面，来往不断。其中尤以郭前旗的蒙族干部来王爷庙担任工作的较多，例如巴图、孙殿忠、高万宝扎布等同志。黑龙江省及其前身嫩江省，从1945年冬开始，即对呼、纳盟有不少支援。

1946年6月，国民党占领了郑家屯后，沿铁路北上，向保康进犯。我兴安省军区第2师周旋于哲盟前线。第一师在兴安盟迎敌。西满分局指示，为确保安全，要兴安省政府撤往大后方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去。于是由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和我负责，包乘一列火车，于6月21日起程，把省政府的干部及其家属撤往海拉尔。张策、哈丰阿、阿思根、胡昭衡等领导同志以及多数青年留在王爷庙准备打仗。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西满分局决定成立兴安省工委分委，以领导省政府和北部两个盟的工作，分委书记为特木尔巴根，我协助他工作。成员有海拉尔市长苏林、滨洲线（齐齐哈尔到满洲里）铁道警备旅长王化一、纳文慕仁盟工委书记夏辅仁、省财政厅长贾石等同志。

兴安省政府搬到海拉尔后，处境相当困难。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呼盟政府要搞“呼伦贝尔独立”，并不欢迎我们，希望省政府撤到扎兰屯去。其次，海拉尔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市警察局110多名武装人员都是原班人马，领导权掌握在可疑的政治势力手中；市内也有地下国民党和“光复军”分子暗中活动，几次有人夜里在我和特木尔巴根窗外打黑枪。第三，迁来海拉尔的省政府成员多是上层分子中中间或偏右的势力及其追随者，其中有一个国民党特务玛尼巴达拉。省政府警卫连未经改造，进步青年为数不多，曾发生过十余人叛逃的事件。共产党员只有特木尔巴根和我二人（贾石同志等是后来的），加上身边有四名警卫员，共六支短枪。滨洲线铁路警备旅在牙克石一个营，海拉尔一个连，都是新兵，又不能参加地方事务。至于呼盟政府的军队，权力也掌握在旧军人手中。面临此种严重情况，省分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对呼盟各派势力进行统战工作，广交朋友。暂不提发动蒙族群众的口号，以缓和对立情绪。二、向省政府上层分子说明我们在呼盟立足的利害关系，争取其合作；密切注意反动分子的动向并对警卫连进行安抚。三、充分发动海拉尔市汉族基本群众，培养干部，建立革命政权，稳住脚跟。因为仅在汉族中发动群众，不会引起盟和省政府内蒙族上层分子太大的震动，他们可能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我们把以上情况和意见向西满分局汇报、请示，得到了批准，西满分局并拨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警卫班和一挺“哑巴”机枪，以壮声势。

早在兴安省政府迁到海拉尔以前，即从1945年冬以来，东北局已派苏林，嫩江省委已派夏辅仁、陈力新，西满分局已派古韦、朱子休等同志到呼、纳两地进行工作。鉴于苏林来海拉尔较早，熟悉本地情况，省政府迁来后，任命苏林兼海拉尔市长

（因他是铁道警备旅的政委）。当时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蒙族问题，由特木尔巴根出面，汉族问题由我出面，以免坏人从中挑拨民族关系。于是依照前述对策，我和苏林深入下去，提出“组织起来，解放自己，建立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市政府”的口号，放手发动市内汉族基本群众，很快成立了各业工会、贫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此外还有原来的“苏联之友社”等群众组织。我们从中选出积极分子组成群众工作队，作为骨干力量。就这样，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接着在西山公园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镇压了汉奸特务，使地下国民党和“光复军”分子感到震慑。随即制定了智取旧警察局的行动方案。因为我们手中只有少数枪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智取。

省分委经过周密的部署，在海市的省分委成员亲临现场指挥。市长苏林于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召集海市巡官以上的警察局官员开会，进行上任“训话”。这是官场惯例，未引起反动分子的猜疑。人到齐后，苏市长讲话，宣传我党政策和时局主张以及新市政府的性质和任务，并提出建立人民纠察队，希望他们自动交出武器，市政府将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说到这里，有几个家伙伸手去腰际摸枪，说时迟，那时快，一直在门外警惕地注视着的我警卫班把“哑巴”机枪往窗口一伸，大声喝道：“不许动！”这一下把他们都吓呆了。早就热血沸腾的群众工作队骨干，从埋伏处一跃而出，相继奔入室内，把所有短枪都缴下来了。这时苏市长宣布，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命令各个警察分所的所长陪同工作人员去各分所制止抵抗，交出武器；并告事毕之后，愿参加革命工作者欢迎，愿回家者发给路费，立功者受奖。于是，各个分所所长走在前面，工作队员持枪随后，分头行事。当天上午，未放一枪，即把全市旧警察武装转移到人民手里。我们立即组织了群众武装纠察队，维持市内秩序。从此，我们手中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紧接着，在群众帮助下，我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国民党地下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反动分子100来人（事后根据各人具